

农村女性的人际信任取向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 (CSS2013)

于铁山

(东莞理工学院 法律与社会工作学院, 广东 东莞 523808)

摘要: 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 (CSS2013), 归纳出农村女性具有特殊信任、制度信任与普遍信任等三类人际信任取向, 并对农村女性三类人际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 农村女性的三种信任具有差异化特征, 农村女性的特殊信任水平在 3.04 与 3.35 之间, 农村女性的制度信任水平在 2.69 与 3.11 之间, 农村女性的普遍信任为 1.60。社会因素与市场化对农村女性人际信任具有不同影响, 农村女性的社会公平感对特殊信任与制度信任、普遍信任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而社会安全感、生活水平与网络媒介对于三类信任没有显著影响; 省份市场化水平与省份 GDP 增速对农村女性特殊信任没有影响, 却对农村女性普遍信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同时省份 GDP 增速对农村女性制度信任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关键词: 农村女性; 人际信任; 市场化; 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8)05-0040-07

The orienta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women's interpersonal trust: Based on the Chinese Social Survey (CSS2013)

YU Tieshan

(School of Law and Social Work, Dongg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ongguan 52380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hinese Social Survey (CSS2013),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rural women have three interpersonal trust orientations: special trust, institutional trust and universal trust, and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women's interpersonal tru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hree kinds of trust of rural women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ial order, the special trust level of rural women is between 3.04 and 3.35, the system trust level of rural women is between 2.69 and 3.11, and the general trust level of rural women is 1.60. Social factors and marketization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rural women's interpersonal trust. Rural women's sense of social justice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special trust, institutional trust and universal trust, while social security, living standards and network media have no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three types of trust. The growth rate has no effect on rural women's special trust, bu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rural women's general trust.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vincial GDP growth rate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rural women's institutional trust.

Keywords: rural women; interpersonal trust; marketizati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人们的信任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 当今社会日益面临信任缺失的危机。当前中国农村社会, 随着社会基础发生深刻变化,

人际信任也变得更为复杂与特殊。因此, 对信任问题开展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 学界对信任的研究长盛不衰, 众多学者揭示了信任与其所嵌入的社会结构有密切的关系。如卢曼视信任为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 指出信任通过复杂性的简化, 排除了某种行动的可能性^[1]。西美尔指出离开人们之间的信任, 社会自身将变成一盘散沙, 社会运行也将不可想象^[2]。一般而言, 学界对信任的分类主要遵循韦伯的二分

收稿日期: 2018-08-31

基金项目: 东莞市哲学社会科学资助项目(2018JY01)

作者简介: 于铁山(1986—), 男, 湖南衡阳人, 讲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社会学。

法,即将信任区分为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前者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后者以信仰共同体为基础。学界围绕信任的二分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孙建华指出市场机制的建立、社会组织的兴起与法制的健全是普遍信任建构的社会基础^[3]。李伟民研究发现中国人既信任与自己有血缘家族关系的个人,也信任与自己有亲近密切交往关系的个人^[4]。董志锋认为中国人的信任是一种情景化的信任^[5]。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出发,高学德、王毅杰等认为中国人的信任是一种差序信任^[6,7]。正是因为差序信任的存在,不同学者对中国的信任状况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福山研究认为,中国社会信任度较低^[8],而王绍光、刘欣的调查却显示中国的信任度较高^[9]。其原因应是前者更多针对普遍意义上的信任,而后者则更多强调对于特定对象的信任。翟学伟沿袭卢曼的范式进一步拓展了信任的维度,从地方性知识出发指出中国人的信任取向不在于是特殊信任还是普遍信任,而在于是否受网络化或制度化的方式制约^[10]。据此翟学伟认为信任有强弱之分,在义务性、熟悉程度方面存在差别^[11]。就女性信任的研究而言,Dow Scott、初浩楠以及高学德等研究认为,女性的信任度要低于男性,女性更容易相信“自己人”^[12-14],Smita G 等认为,信任在女性的自助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15]。Asiyeh Salehi 对伊朗女性进行调查后发现,人际信任与生活质量相关,良好的人际信任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16]。

纵观以往文献,学界多围绕信任的二分法进行研究,对女性人际信任进行研究也多从静态的视角进行考察,相对忽视了社会变迁背景下的女性人际信任研究。作为农村留守主力女性,不可避免受到乡土性与现代性的双重影响,其人际信任强弱不仅取决于对方是谁,还取决于对方特定身份背后的制度设置。为此,笔者拟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SS2013),将制度与角色等纳入信任范畴,探讨农村女性的普遍信任、特殊信任和制度信任三类人际信任取向,并分析社会因素与市场化对农村女性人际信任的影响,以为重塑农村健康的信任关系提供借鉴。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 社会因素与农村女性的人际信任

相对于城市,农村保留着大量的传统社会结构

与文化,中国传统的伦理本位决定了个人对家庭邻里具有较高的信任水平,如乡土社会的信任来源于彼此的熟悉程度^[17]。这种特殊信任的社会基础是传统社会的伦理秩序。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农村正在经历现代化的浪潮,传统农村的差序格局在不断发生变化,其人际信任赖以形成的社会基础受到了很大冲击,人际信任由注重对他人托付的义务承担型转变为对人际关系及制度角色的技能掌握型^[18]。社会转型理论始于对社会公平的关注^[19],进而涵盖社会安全、网络传媒与生活水平等众多领域。目前针对社会因素与政治信任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多,在社会安全方面,有学者认为政治信任与社会安全之间有密切关系^[20];在媒介方面,研究发现使用旧媒体会增加对政府的信任,而使用新媒体会降低对政府的信任^[21];在社会公平方面,社会公平已成为农民基层政治信任的重要来源^[22]。参考社会因素与政治信任之间关系的研究,本文认为社会因素对农村女性人际信任有如下影响:互联网的兴起特别是负面人际信任新闻的传播提升了人际关系的不信任感,而社会公平感、社会安全感与生活水平等主观认识对人际信任则具有积极作用。据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_{1a}:社会公平感对农村女性的三类信任具有正向影响。

H_{1b}:社会安全感对农村女性的三类信任具有正向影响。

H_{1c}:生活水平对农村女性的三类信任具有正向影响。

H_{1d}:网络媒介对农村女性的三类信任具有负向影响。

2. 市场化与农村女性的人际信任

信任提高了制度运行的效率,节省了交易的成本^[23]。人们是否信任他人更多取决于信任可能带来的风险计算,因此人们的信任具有一定程度的非人格化特征。一般认为,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市场化的推进对信任会产生重大影响,市场化进程与居民政府信任水平呈线性递减关系^[24]。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会形成以市场为核心的机会结构^[25],从而影响到人们的人际信任。市场化改变了传统的农村社

会结构,不同地区的市场化水平有高低之分,农村女性的人际信任会呈现出地区分化,地区市场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即 GDP 增速会影响农村女性的人际信任,据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_{2a}:地区市场化水平对农村女性的三类信任具有正向影响。

H_{2b}:地区 GDP 增速对农村女性的三类信任具有正向影响。

三、变量与模型选择

1. 变量选取

因变量是农村女性人际信任,通过问题“您信任下列人员吗?”来测量,人际信任对象包括亲戚朋友、邻居、单位领导/上司或老板、警察、法官、党政领导干部、党政机关办事人员、企业家、教师、医生、陌生人等 11 类对象。在对 11 类对象的信任进行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将原始的 11 个变量和指标提取成几个综合变量,以达到浓缩指标的目的。

提取公因子操作分为四步,第一步检验因变量信任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检验结果显示 KMO 值为 0.851,较为适合提取公因子。第二步采取主成分法提取公因子,并确定因子个数,保留特征值大于等于 1 的主成分作为初始因子,共提取 3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成分。成分 1 的特征值是 4.767,可解释原有 11 个变量总方差的 43.34%,成分 2 的特征值是 1.306,可解释原有 11 个变量总方差的 11.88%,成分 3 的特征值是 1.067,可解释原有 11 个变量总方差的 9.70%,三个成分共解释原有变量总方差的 64.92%。第三步是采用最大方差法进行因子旋转(表 1),利用旋转使得因子变量更具有可解释性,旋转结果显示亲戚朋友信任、邻居信任在第 1 个因子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可解释为特殊信任;单位领导/上司或老板、警察、法官、党政领导干部、党政机关办事人员、企业家、教师、医生在第 2 个因子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可解释为制度信任;陌生人信任在第 3 个因子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可解释为普遍信任。最后分别计算出特殊信任、普遍信任和制度信任的得分。

表 1 农村女性人际信任旋转成分矩阵

信任对象	制度信任因子	特殊信任因子	普遍信任因子
亲戚朋友	-0.215	0.911	0.004
邻居	-0.029	0.771	0.237
单位领导/ 上司或老板	0.397	0.257	0.272
警察	0.885	-0.124	-0.034
法官	0.861	-0.081	-0.018
党政领导干部	0.872	-0.099	0.097
党政机关办事人员	0.862	-0.068	0.088
企业家	0.559	0.031	0.376
教师	0.493	0.408	-0.268
医生	0.619	0.276	-0.289
陌生人	-0.005	0.071	0.851

解释变量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社会因素变量。主要包括调查对象社会层面的主观认知和网络媒介变量。主观认知包括社会安全感、社会公平感与生活水平等。其中社会安全感指总体上的社会安全状况,分为很不安全、不太安全、比较安全、很安全。社会公平感通过问题“您觉得当前社会生活中总体社会公平程度如何?”测量,答案分为非常不公平、不太公平、比较公平、非常公平、不好说。生活水平通过问题“与 5 年前相比,您的生活水平有什么变化?”来测量,答案分为上升很多、略有上升、没变化、略有下降、下降很多。网络媒介变量在一定程度上会形塑女性的信任观,因此将其纳入社会层面进行考察。

二是市场化层面的解释变量。针对多层次线性分析,市场化层面的变量包括省份 GDP 增速和市场化水平。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4775。

2012 年各省市 GDP 增长率如下:贵州 19.3%,云南 15.93%,陕西 15.5%,上海 4.72%,浙江 7.08%,广东 7.25%,北京 9.53%,江苏 10.08%,西藏 14.81%,重庆 14.46%,天津 13.95%,四川 13.43%,湖北 13.33%,海南 13.18%,吉林 12.95%,青海 12.82%,湖南 12.63%,甘肃 12.55%,安徽 12.49%,福建 12.20%,辽宁 11.58%,内蒙古 11.34%,广西 11.18%,河南 10.69%,宁夏 10.68%,江西 10.64%,山东 10.25%,黑龙江 8.82%,湖北 8.40%,山西 7.79%^[26]。

根据樊纲的研究,获取到 2013 年各省市市场化指数^[27]。北京 8.31,青海 2.64,甘肃 3.38,贵州 4.36,宁夏 4.37,云南 4.49,西藏 0,山西 4.89,

陕西 5.18, 内蒙古 5.34, 海南 5.44, 湖北 5.58, 湖南 5.73, 江西 5.74, 黑龙江 6.01, 四川 6.10, 吉林 6.15, 广西 6.19, 湖北 6.32, 安徽 6.36, 河南 6.48, 辽宁 6.65, 重庆 6.89, 福建 7.27, 山东 7.41, 广东 8.37, 上海 8.67, 天津 8.87, 浙江 9.33, 江苏 9.95。

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年龄、受教育年限、政治身份等。其中政治身份分为中共党员、共青团员与群众等三类。

2. 模型选择

考虑到不同地区农村女性人际信任可能存在差异, 采用随机效应方差分析检验三种农村女性人际信任取向的省份效应, 结果显示农村女性制度信任因子与特殊信任因子未能通过检验, 农村女性普遍信任 $ICC_{f3}=0.107$, 属于中度关联强度, 说明农村女性的普遍信任存在显著的省际差异, 宜采用多层线性分析方法。特殊信任与制度信任则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 (OLS)。

四、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

表 2 变量定义及样本特征

变量	变量分类	均值	标准差
年龄	连续性变量	45.600	13.420
政治身份	中共党员=1, 共青团员=2, 群众=3	2.918	0.334
教育	未上学=0年, 小学=6年, 初中=9年, 高中中专高职技校=12年, 大专=15年, 大学本科=16年, 研究生=19年	6.370	4.166
收入对数	连续性变量	9.072	2.633
网络媒介	使用互联网=1, 不使用互联网=0	0.186	0.389
社会安全感	很不安全=1, 不太安全=2, 比较安全=3, 很安全=4	2.920	0.521
社会公平感	非常不公平=1, 不太公平=2, 比较公平=3, 非常公平=4	2.679	0.595
生活水平	上升很多=1, 略有上升=2, 没变化=3, 略有下降=4, 下降很多=5	2.145	0.896
市场化水平	30个省市 2013 年的市场化指数	6.080	2.060
GDP 增速	30个省市 2012 年的 GDP 增速	11.650	3.010

五、实证研究结果及其分析

1. 农村女性制度信任和特殊信任的影响因素

分别建立农村女性制度信任与特殊信任的回归模型并进行农村女性普遍信任的多层线性回归分析。针对农村女性制度信任与特殊信任构建三种

(Chinese Social Survey, 简称 CSS)。该数据是中国社科院采用多阶段分层混合抽样在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获取样本地址, 并利用地图地址抽样方法进行入户面访所得。在 CSS2013 调查问卷中设置测量人际信任程度的量表。由于本研究调查对象是农村女性, 共筛选出符合条件的 3 920 名农村女性, 采用的统计分析软件是 stata12.0 版。

2. 样本特征

通过四点量表对农村女性人际信任进行测量, 其中完全不信任=1、不太信任=2、比较信任=3、非常信任=4。从农村女性对于特定对象的平均人际信任分值来看, 农村女性人际信任的强弱因对象关系的亲疏呈现出由近及远的差序特征。其中, 对亲戚朋友信任得分 3.35, 对教师信任得分 3.20, 对医生信任得分 3.11, 对邻居信任得分 3.04, 对警察信任得分 2.97, 对法官信任得分 2.92, 对单位领导上司信任得分 2.69, 对党政领导干部信任得分 2.65, 对党政机关办事人员信任得分 2.62, 对企业家信任得分 2.53, 对陌生人信任得分 1.60。由此可知农村女性对亲戚朋友的特殊信任水平最高, 制度信任水平次之, 普遍信任水平最低。样本特征如表 2 所示。

模型, 模型 1 是基准模型, 模型 2 加入了网络媒介、社会安全感、社会公平感与生活水平等社会因素变量, 模型 3 加入省份市场化水平与省份 GDP 增速变量。结果见表 3。

表 3 农村女性制度信任与特殊信任的回归分析

	农村女性特殊信任			农村女性制度信任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年龄	0.0161*** (0.00372)	0.0122** (0.00399)	0.0122** (0.00400)	0.00477 (0.00377)	0.000736 (0.00378)	0.000831 (0.00377)
共青团员 ^a	-0.117 (0.242)	-0.0472 (0.234)	-0.0373 (0.235)	-0.336 (0.245)	-0.166 (0.221)	-0.119 (0.221)
群众 ^a	-0.199 (0.206)	-0.0722 (0.200)	-0.0671 (0.201)	-0.493* (0.209)	-0.265 (0.190)	-0.241 (0.189)
教育	0.00396 (0.0117)	0.0196 (0.0121)	0.0187 (0.0122)	-0.0268* (0.0118)	-0.00814 (0.0115)	-0.0119 (0.0115)
收入对数	-0.0127 (0.0185)	-0.00391 (0.0190)	-0.00449 (0.0191)	-0.0197 (0.0187)	-0.00588 (0.0181)	-0.00710 (0.0180)
网络媒介		-0.163 (0.104)	-0.166 (0.105)		-0.134 (0.0988)	-0.157 (0.0989)
社会安全感		0.139 (0.0872)	0.142 (0.0875)		0.139 (0.0827)	0.153 (0.0825)
社会公平感		0.304*** (0.0694)	0.303*** (0.0696)		0.676*** (0.0658)	0.675*** (0.0656)
生活水平		-0.0357 (0.0452)	-0.0350 (0.0453)		0.0346 (0.0428)	0.0386 (0.0427)
省份市场化			-0.00123 (0.0219)			-0.0262 (0.0206)
GDP增速			-0.0102 (0.0183)			-0.0469** (0.0172)
常数	-0.334 (0.353)	-1.560*** (0.460)	-1.432** (0.541)	0.725* (0.358)	-1.804*** (0.437)	-1.116* (0.510)
N	633	606	606	633	606	606
R ²	0.041	0.105	0.105	0.030	0.233	0.243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a参照组是中共党员。

由表 3 可知,在农村女性特殊信任回归分析中,户口类型、政治身份、受教育年限与收入变量在统计上均不显著,年龄对农村女性的特殊信任具有正向影响,说明年龄越大的农村女性对亲属朋友、邻居的特殊信任越高,农村女性年龄每增加 1 岁,对亲属朋友、邻居的信任提高 0.0122 倍,社会变量对农村女性特殊信任具有显著影响,能够解释掉 6.5% 的因素,农村女性社会公平每增加 1 个等级,则特殊信任程度提高 0.304 个单位, H_{1a} 得到支持。社会安全感、生活水平与网络媒介变量在统计上不显著, H_{1b} 、 H_{1c} 与 H_{1d} 未被统计结果所支持。市场化水平与 GDP 增速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特殊信任不会因为市场化水平与 GDP 增速发生变化。

在农村女性制度信任回归分析中,年龄、网络媒介与收入变量对制度信任均无显著影响,政治身

份与受教育年限在模型 1 上显著,但如果加入其他社会变量,这些变量变得不显著。具体来看,相对于农村女性中共党员,农村女性群众的制度信任要低 49.3%,意味着农村女性中共党员的制度信任水平更高,一方面农村中共女性党员具有门槛效应,另一方面农村中共女性党员的组织化意识更为强烈,更容易信任制度化角色。农村女性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1 年,则制度信任水平下降 0.0268 个单位。相对于模型 1,模型 2 中社会因素对制度信任具有较高的解释力,其解释力为 23.3%。农村女性社会公平感每增加 1 个等级,则制度信任程度提高 0.676 个单位,社会安全感、生活水平与媒介变量在统计上不显著。模型 3 的统计结果显示市场化水平对于制度信任没有影响,但地区 GDP 增速在统计上显著,地区 GDP 增速每提升 1 个单位,则农村女性制度信任下降

0.0469 个单位,这可能与 GDP 增速带来的绩效合法性没有转换成社会公平感有关。

一个有趣的发现在于农村女性的社会公平感知越高,其特殊信任与制度信任程度越高,说明对于亲属朋友、邻居等特定对象的特殊信任在现代社会正在发生变化,这可能与农村女性在现代社会更多遭遇信任风险有关。从模型的解释力来看,社会因素对制度信任的解释力要明显高于特殊信任。H_{1a} 被统计结果所支持,而 H_{1b}、H_{1c}、H_{1d} 与 H_{2a} 未得到证明。

2. 农村女性普遍信任的影响因素

如前所述,农村女性人际普遍信任具有明显的省际效应,因此采用多层线性分别设置四种模型。在模型 2 中,由第二层的地区变量“市场化指数”与“GDP 增速”作为自变量对普遍信任进行回归预测。模型 3 是在以平均数为结果模型的基础之上的随机截距模型,在第一层回归模式中引入 8 个自变量,仅有年龄、政治身份、社会公平感变量对农村女性的普遍信任具有显著影响,结果见表 4。

表 4 农村女性普遍信任多层线性回归分析

	零模型(1)	以平均数为结果模型(2)	随机截距模型(3)	随机系数模型(4)
年龄			0.0123** (0.00395)	0.0127** (0.00394)
共青团员 ^a			-0.0662 (0.229)	-0.0661 (0.228)
群众 ^a			-0.433* (0.195)	-0.426* (0.195)
教育			-0.00174 (0.0125)	0.00147 (0.0124)
收入			0.0116 (0.0190)	0.0129 (0.0189)
网络媒介			0.122 (0.104)	0.116 (0.103)
社会安全感			0.117 (0.0864)	0.123 (0.0861)
社会公平感			0.311*** (0.0683)	0.301*** (0.0681)
生活水平			0.0411 (0.0445)	0.0417 (0.0444)
省份市场化水平		0.0920* (0.0376)	0.0803* (0.0406)	0.0814* (0.0320)
省份GDP增速		0.0801** (0.0278)	0.0746* (0.0301)	0.0645* (0.0277)
固定效应截距	0.00355 (0.0822)	-1.480** (0.480)	-2.817*** (0.683)	-2.760*** (0.626)
卡方值	30.26***	16.71***	19.56***	24.81***
-2LL	1 977	1 969	1 640	1 634
N	708	708	606	606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a 参照组是中共党员

具体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农村女性的年龄每增加 1 岁,则普遍信任提高 0.0127 倍,相对于农村女性中共党员,群众的普遍信任水平更低,农村女性的社会公平感每增加 1 个等级,则普遍信任提高 0.301 倍,H_{1a} 被统计结果所支持,由于

社会安全感、生活水平与网络媒介变量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H_{1b}、H_{1c} 与 H_{1d} 未得到证明。

在随机截距模型第二层回归模型中,引入省份市场化指数与省份 GDP 增速两个变量。结果显示市场化指数与 GDP 增速两个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

检验,说明市场化指数与地区GDP增速对不同地区的普遍信任回归模式中的截距项产生显著影响。具体来说,地区市场化程度指数每提高1个单位,该地区普遍信任水平提高0.0814倍。地区GDP增速每提高1个单位,该地区普遍信任水平提高0.0645倍, H_{2a} 与 H_{2b} 得到部分证明。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从传统的二元信任结构出发,根据不同的信任对象,将农村女性人际信任关系分为特殊信任、制度信任与普遍信任三种人际信任取向,统计分析发现农村女性人际信任受到社会因素与市场化的双重影响,这种影响对农村女性不同类别的人际信任存在差异,具体可得出如下结论:

一是年龄越大的农村女性对于亲属朋友、邻居等特殊对象的特殊信任与对于陌生人的普遍信任水平越高;二是农村女性的特殊信任不受政治身份影响,而其制度信任与普遍信任受政治身份影响,农村女性中共党员的制度信任与普遍信任要显著高于农村女性群众;三是农村女性社会安全感提升有助于增加制度信任、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四是市场化水平能显著提高农村女性的普遍信任水平,省份GDP增速对于农村女性的普遍信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农村女性的制度信任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五是省份市场化水平对于制度信任与特殊信任没有影响,意味着农村女性对亲属朋友、邻居等特殊对象与警察、法官、党政工作人员、企业家、教师、医生等制度角色在市场化条件下的信任基础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六是农村女性的社会安全感、生活水平与网络媒介对于人际信任没有显著影响。

上述研究结论具有多方面的启示意义:一是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半边天”角色的农村女性具有特殊信任、制度信任与普遍信任三种人际信任取向,并表现出差序信任的特征,鉴于农村女性的普遍信任水平明显低于特殊信任与制度信任,因此要提升农村女性对于陌生人的信任,需大力提升市场化水平与推动GDP增速;二是乡村振兴战略要高度重视社会公平原则,在保证省份GDP增速的前提下,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效应,建设公平公正的

农村社会,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农村女性的制度信任水平,还能显著提升农村女性对所有对象的人际信任水平;三是针对农村女性党员的制度信任与普遍信任水平均高于农村女性群众这一结论,为提升农村女性的制度信任水平,应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农村女性党员在提升农村人际信任方面的先锋模范作用,以缓解当前农村社会的信任缺失危机。

注释:

本文使用数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调研所得,项目主持人为李培林,感谢上述机构及其人员提供数据协助,论文内容由作者自行负责。

② 根据Cohen(1988)所建议的判断标准,当 $0.059 > \rho > 0.01$ 时,为低度关联强度;当 $0.138 > \rho \geq 0.059$ 时,为中度关联强度;当 $\rho \geq 0.138$ 时,为高度关联强度。

参考文献:

- [1] 卢曼.信任[M].瞿铁鹏,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32.
- [2] 西美尔.货币哲学[M].陈戎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11.
- [3] 孙建华.论中国普遍信任建构的社会因素[J].山东社会科学,2002(2):110-111.
- [4] 李伟民,梁玉成.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中国人信任的结构与特征[J].社会学研究,2002(3):11-22.
- [5] 童志锋.信任的差序格局:对乡村社会人际信任的一种解释——基于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信任的实证分析[J].甘肃理论学刊,2006(3):59-63.
- [6] 高学德.中国社会人际信任呈现差序格局[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
- [7] 王毅杰,周现富.城市居民信任的差序格局[J].天府新论,2009(2):102-105,133.
- [8] 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107.
- [9] 王绍光,刘欣.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J].社会学研究,2002(3):23-39.
- [10] 翟学伟.信任的本质及其文化[J].社会,2014(1):1-26.
- [11] 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47.
- [12] Dow Scott. Trust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in Superior-Subordinate Relationships[J]. Group & Organizational Studies, 1983, 8(3): 319-336.
- [13] 初浩楠,廖建桥.青年人对自己人和外人信任的性别差异研究[J].青年研究,2007(11):43-50.

(下转第79页)